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

杜　維　運

一、概　說

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史學，與中國史學，是兩種不同文化的產物。以儒家學術思想爲主流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富人文主義色彩的中國史學；而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與科學，促使西方史學從最富神學色彩，變至講求精確與客觀。綜合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的中西史學，取其精英，去其糟粕，將是人類史學上的盛事。

文化的接觸，到史學發生交流現象，是極爲後期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千餘年來，有過不少的接觸與相互影響，從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及於西方的啓蒙運動，到西方耶穌會教士的東來，以及晚近西方學術、政治、軍事、經濟勢力的如怒潮湧至，無一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但是在晚近以前，中國史學不曾流傳到西方去，西方史學也未曾輸入中土。作爲文化中樞的史學，極不易爲人類發現其價值。

發現對方史學的價值，積極予以吸收，首先在中國而不在西方。一九四二年美國史學家湯姆森（J. W. Thompson）出版其大著**史籍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時，似乎不甚清楚中國有史學著作；[1] 一九六一年英國史學家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　）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講「歷史與人類對過去之態度」（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則云：「我相信沒有任何文化比西歐一四五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的文化，更富歷史觀念。爲窺尋此一期間西歐文化的淵源，我們必須注意到亞洲去；但是知道什麼因素促使我們文化的發展如此特殊，也同樣的有用。」「如果東方學者能從西方史學獲得啓示，那麼西方學者非到他瞭解了東方，將永不能領悟到重要問題的神奧處。一旦我們試着超越我們自己的思想界，等量齊觀地看中西兩大史學系統，主要的分歧，便暴露無遺。此兩文化對歷史與傳統皆有其可怕的成見；兩者歷史精神太不相同，兩者思想系統（太不相同的系統）太複雜。」[2]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浦朗穆（J. H. Plumb）仍然說：「自文藝復興以來，史學家逐漸決定致力於瞭解曾經發生的往事，爲瞭解而瞭解，不是

[1] 參見拙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頁六～七。

[2] 白氏演講後，復將講詞簡化，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英國廣播公司廣播，Listener 雜誌刊其全文，今係自其中節引。

爲宗教，不是爲國運，不是爲道德，也不是爲神聖化的制度；……史學家日趨於窺探往事的眞相，而希望自此建立有歷史根據的社會轉變的軌跡。這是一西方的發展，本人認爲如此。部分我所尊敬的史學家，將持異議，他們會感覺我過分誇大了中國與西方史學的區別。竭盡能力閱讀翻譯作品，我已知曉中國史學的精細，知曉中國史學的重視文獻，知曉中國史學的發展其制度變遷的觀念，已大致能排除借歷史以衍出的天命觀念。中國唐代史學家顯然遠優於恩哈德（Einhard），或奧圖（Otto of Freising），或任何中世紀早期編年家，就像中國聖人在技藝或行政方面的優越一樣。但是中國史學的發展，永遠沒有突破通往眞歷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眞相，不顧由此引發與利用過去的時賢衝突。中國人追逐博學，然永遠沒有發展富批評性的史學（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富批評性的史學，是過去兩百年西方史學的重要成就。至於中國人永遠沒有意思視歷史爲客觀的瞭解(objective understanding)，則更不待細說了。」[3] 西方史學家在西方逐漸失去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優勢時，仍然不肯輕易承認中國史學曾到達西方史學所到達的最高境界。虛心的接受中國史學，對目前西方史學界而言，尙沒有這種意識型態出現。

反觀中國則不然。兩千餘年唯我獨尊的中國史學，在西方軍事、政治、經濟的威勢下，其藩籬被衝破了，其所奠定的權威地位，開始動搖了，接受西方史學理論，採用西方史學方法，以從事於研究國史，變爲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風氣。迄於今日，已極少有人否定西方史學的重要性，懷疑中國史學的價值與成就者，則大有其人。中國史學無疑問已面臨最嚴重的考驗階段，它能否歷久常新，與西方史學同放萬丈光采於世界史學之林，應是今後學術上極值注意的大事。

學術是天下的公器，綜合中西史學，以開創今後更進步更豐富的具世界性的新史學，應是人類學術史上的新猷，而首先承此重任者，必是以泱泱文化作背景的中國史學家。今謹略事爬梳資料，作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期以說明近代中國史學界接受西方史學的程度，進一步的綜合大業，則期之時賢。

二、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初期——晚清

1. 晚清思想界與西方史學的輸入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確定時間，是一個頗難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朝野人士，由於受西方的壓迫，紛言變法圖強，淸廷也屢屢派遣留學生赴海外留學，然當時留學生在海外所攻習的科目，爲軍事、教育、經濟、政治等等，朝野人士

[3] J.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1969, pp. 12-13

所談的變法，也不出軍事、教育、經濟、政治等範圍以外，當時從未有談變史學以及在海外專門攻習西方史學者。所以在李鴻章等如火如荼推行洋務運動之際，西方史學似未曾輸入中國。

西方史學的輸入，大致在清政權即將結束之十餘年間，此與晚清思想界有極密切的關係。

晚清是中國新舊思想互相激盪的一個時代，保守的人士，對於日漸向中國輸入的西學，持極力反抗的態度。如倭仁云：

「竊聞立國之道，尙禮義不尙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卽使敎者誠敎，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4]

曾廉亦云：

「中人之學西學，不過爲通西人語言、文字諸藝術，借以刺取外國之國情，奪其利權而制之。」

「故必心術端慤而學問通達，學之始有用。無學之人學之，但知順夷意而變我民，使人相率入于夷狄；然苟其人爲學問通達，不一定能學外國語言文字，故西學實無提倡之必要。」[5]

此種觀念，普及於一般讀書人的腦海中，對於接受西方史學，實爲莫大的障礙。於是稍有世界性眼光者，倡出西學源出中國之說，如江標云：

「凡諸西學之急需，皆我中邦之素習。蓋格致之學，本大學之所兆基，特機械之心，爲我儒所不尙耳。至於合中西爲一學，則異柯同本，異派同源，並非舍己而從人，背師而他學也。」[6]

皮錫瑞則云：

「今之學者，有漢學，有宋學。講漢學者，有西漢今文之學，有東漢古文之學。講宋學者，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日又以專講中學者爲舊學，兼講西學者爲新學。學者黨同伐異，總以學自己是，人家不是。平心而論，漢學未嘗不講義理，宋學未嘗不講訓詁。同是師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西學出於中國，本周秦諸子之遺，莊列關尹諸書所載，是其明證。史記漢書皆云七國之亂，嘯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約此時中國失傳，而外國得之。今仍傳入中國。仲尼問官於剡子

[4]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頁二四。

[5] 同上

[6] 江標變學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據聖人之言，西學苟可采用，不必過分畛域。總之，無論何項學術，皆當自求心得，不當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訪，互相印證，以折衷於一是。即學派宗旨，不可强合，儘可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妨有異同，不必爭門戶。」[7]

西學與中學，本爲兩個世界的文化產物，絕不相同，其間雖有類似，祇是在「東海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情況下，所自然形成的。一定說西學源出中國，實極盡牽强附會之能事。不過晚清流行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另有其積極的意義。即爲西學的輸入作護符。「合中西爲一學，則異柯同本，異派同源，並非舍己而從人，背師而他學。」「西學苟可采用，不必過分畛域。」此適可破保守派「何必師事夷人」、「西學實無提倡之必要」的主張。所以到嚴復，便進一步說：

「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Sir Isaac Newton）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8]

承認中西之學相通，而不認爲西方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尤其否認其學皆得於東來，這已較西學源出中國之說，更進一步了。

晚清思想界既開放，西方史學遂有輸入的可能。當時有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出現。如嚴復云：

「生於民滿之日而遭亂者，號爲暴君汚吏。生於民少之日獲安者，號爲聖君賢相。二十四史之興亡治亂，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無亂，何所謂一治一亂哉！

[7] 湘報類纂乙集卷下頁三。

[8] 嚴幾道詩文鈔卷四頁二～三。

夫此羣中均身體弱智識昏之人，則其人愈多，爲累愈甚，於是雖有善者，必爲不善者所累而自促其生。積數十人或數百人以累一人，是不啻以勤儉自立之人，受役於游惰無業之人也。而有志者先死，因而劣者反傳，而優者反滅。然若優者盡死，則劣者亦必不能自存，滅種是矣。」[9]

此爲反一治一亂的循環論。

黃尊憲云：

「自儒者以筆削說春秋，謂降杞爲子，貶荆爲人，所以示書法，是謬悠之譚也。自史臣以內辭尊本國，謂北稱索虜，南號島夷，所以崇國體，是狹陋之見也。夫史家紀述，務從實錄，無端取前古之人，他國之君，而易其名號，求之人情，奚嘗於理？」[10]

此爲反以天朝爲中心的歷史記載。

徐仁鑄云：

「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迹，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故觀君史民史之異，而立國之公私判焉矣。今日欲考歷朝民俗，求之於正史反不可得，而別史雜史之類，時復記載之，亦學者所當厝意也。」[11]

此爲反以帝王爲中心的史學傳統。

唐才常云：

「司馬遷深於孔教者也。其文洞見本原，直刺時隱，進游俠，非好亂也，悼民權之衰也。稱貨殖，非逐末也，憫商學之失也。陳六家要指而評衡之，非等倫儒墨也，謂泥守弊生進于大同則有濟也。而目論之儒，誚其是非繆于聖人。嗚呼！孔教微，無公理；公理微，無信史。後世史家，言例、言法、言閏、言正、言道學儒林，其上能整齊故事，藉資參考；其下則魏收作色，梦如亂絲。無他，二千年來政學汶闇，微獨春秋文致太平之宏旨不可聞，即司馬氏損益得失之微權不可復。讀史者，習見夫唐宋以降規規舊制，方謂老成；附會尊攘，方名忠義；務抑民氣，方尊朝權；禁談時務，方端士習；力遏新學，方正人心。於是事事求副于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網羅鉗束之私心，身衿纓而心圈芷，曰是固宜然。」[12]

[9] 同上卷二頁七。

[10] 黃尊憲日本國志，凡例。

[11] 湘學新報第三十册。

[12] 同上第五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亦爲痛陳司馬遷以後中國史學的缺失。

以上種種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未必然都極正確，但是不可否認地都有其時代性，西方的進化論輸入，自然要有人反對治亂循環的史觀了；萬國林立，國與國之間地位平等之義昌明，自然要有人反對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史載了；民權思想高張，自然要有人斥正史爲帝王家譜，而嚮往西方注重民生社會之史了。

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史學乃繼軍事、政治、經濟之後，向中國湧入。

2. 歷史進化論的輸入

西方史學首先輸入中國的，爲歷史進化論。

中國是一個留戀過去的民族，認爲愈是古代，愈是理想的時代，葛天氏之民，生活最美好，堯舜時則開創以天下相揖讓的局面，風俗亦由淳樸漸至澆譎。因此史學家是相信歷史退化的，歷史的發展，每況愈下。[13] 歌頌古代，成爲史學家的自然心聲，治亂循環論也由此而產生。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嚴復所譯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問世，不啻中國思想界的晴天霹靂。赫胥黎是英國生物學家與實證主義哲學家，達爾文（C. R. Darwin, 1809–1882）的朋友，自達氏**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版，他即是進化論的熱烈贊成者，他說「天演」云：

> 「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14]

這是赫氏天演論的主要觀念，嚴氏加以解釋說：

---

[13] 王夫之富有進化思想，似爲一特例。如他於讀通鑑論卷二〇云：「古之天下，人自爲君，君自爲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尚，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惟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就一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蘇。故孟子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必卽一而漸一之也。」

[14] 嚴譯天演論頁二。

「復案：物競天擇二義，發於英人達爾文。達著物種由來一書，以考論世間動植物類所以繁殊之故。……知有生之物，始於同，終於異，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運之，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創造者也。……自茲厥後，歐美二洲治生學者，大抵宗達氏。……故赫胥黎謂古者以大地爲靜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繞周流，以地爲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運，古者以人類爲首出庶物，肖天而生，與萬物絕異，自達爾文出，知人爲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宗教博士之說，必不可信。蓋自有歌白尼而後天學明，亦自有達爾文而後生理確也。」[15]

可見赫氏天演的物競天擇之說，出於達爾文；達氏用科學的方法，考生物的發展，知道生物都由進化而來，其所以生存，源於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人是生物之一，所以不例外；人之能首出庶物，也是由於競爭，非得天獨厚。赫氏繼此說而其天演論出。

自從嚴復翻譯**天演論**以後，西方的進化思想，風靡於中國思想界，民鐸出進化論號二冊[16]，內有陳兼善的進化之方法、進化論發達史、達爾文年譜；專書則有馬君武譯的達爾文物種原始，陳兼善的進化論綱要，張質平的人類進化論。胡適介紹達爾文的進化思想，尤其清楚：

「達爾文的主要觀念是：『物類起于自然的選擇，起於生存競爭裏最適宜的種族的保存。』他的幾部書都只是用無數的證據與事例來證明這一個大原則。……單只那書名——物類由來——把『類』和『由來』連在一塊，便是革命的表示。因爲自古以來，哲學家總以爲『類』是不變的，一成不變就沒有『由來』了。例如一粒橡子，漸漸生芽發根，不久滿一尺了，不久成小橡樹了，不久成大橡樹了。這雖是很大的變化，但變來變去，還只是一株橡樹，橡子不會成鴨脚樹，也不會變成枇杷樹，千年前如此，千年後也還如此。這個變而不變之中，好像有一條規定的路線，……這個法式的範圍，亞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Eidos)，平常譯作『法』。……達爾文不但證明『類』是變的，而且指出『類』所以變的道理。……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觀念。如果一切生物全靠着時時變異和淘汰不適於生存競爭的變異，方才能適應環境，那就用不着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來計劃規定了。況且生存的競爭是很慘酷的，若有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何以生物界還有這種慘劇呢？」[17]

[15] 同上頁四。

[16] 民鐸卷三第三四號。

[17] 胡適文存二集二卷頁二三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類由來出版以後，歐美的學術界都受了一個大震動。十二年的激烈爭論，漸漸的把上帝創造的物種由來論打倒了，故赫胥黎在一八七一年曾說：『在十二年中，物類由來在生物學上做到了一種完全的革命，就同牛敦的 Principia 在天文學上做到的革命一樣。』但當時的生物學者及一般學者雖然承認了物種的演化，還有許多人不肯承認人類也是由別的物類演化出來的。人類由來的主旨只是老實指出人類也是從猴類演化出來的。」[18]

進化思想輸入以後，自然直接影響國人對歷史的看法，而進化的史觀產生。自此以後，國人不再完全沉醉過去了；中國史學家不再以「古勝於今」作爲解釋歷史的最大標準了；中國史學自此進入一新世紀。

3. 梁啓超首倡「新史學」

從光緒二十年到宣統三年之間（一八九四——一九一一），是中國政治上的動盪時期，國人所醉心者，爲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新說，以及中國前所未有而令人有驚心動魄感覺的學術思想。西方十九世紀初葉以來所發展的極富科學精神的史學，此時不曾廣泛引起國人的注意。由欣羨西方學術思想而及於史學，是一種額外的收穫。所以當對政治與學術思想極富興趣的梁啓超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發表了一篇題名叫做「新史學」的文章的時候，中國史學界即掀起了極大的波瀾。梁氏在這篇文章裏，對於西方史學，已有約略的認識：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19]

對於中國史學，梁氏則肆力攻擊：

「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20]

進一步梁氏認爲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此即梁氏所謂四蔽。緣此四蔽，復生二病，「能鋪敍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猫，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

[18] 同上頁二一一。
[19] 飲冰室文集第四册頁一。
[20] 同上頁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塡塞，皆此等鄰猫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他更何論焉。」[21]

從以上可知梁氏已應用西方史學來批評中國史學作品了。所以在晚清梁氏已有輸入西方史學的大功。雖然梁氏當時所瞭解的西方史學極爲有限，他沒有直接閱讀西文書籍的能力，僅能間接從日文書籍曉得一些西方史學，但是以他的言論在當時的影響力而言，其「新史學」一文，對於中國接受西方史學，實有開導的作用。至於梁氏瞭解較多的西方史學，則在歐遊以後，那已是民國時代了。

三、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第二期——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一二——一九三七）

從民國建立，到抗日戰爭發生，是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最盛時期。此一時期所發生的五四運動，促使國人醉心於接受西方文化，史學界此時亦深深注意到西方異於中國的史學，而積極予以輸入。

1. 梁啓超所輸入的西方史學

此一時期梁啓超仍然是輸入西方史學的重要功臣之一。他曾遊歐洲，接觸到一部分西方史學。據李宗侗先生云：

「中國史學方法論第一部書是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先生到歐洲去的時候，我恰好住在巴黎，他請了很多留法學生給他講述各門的學問，恐怕史學方法論亦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另補充上很多中國的材料，但其原則仍不免受外國人的影響。」[22]

梁氏係於歐戰結束（一九一八年）後往遊歐洲，民國九年（一九二〇）返國。此時正值班漢穆（E. Bernheim）、朗格諾瓦（Ch. V. Langlois）與瑟諾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學方法最爲盛行的時候[23]，梁氏所請留法學生給他講述的各門學問，史學方法是其

[21] 同上頁五。

[22] 見正中書局出版**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人文科學之部史學前言**。

[23] 一八八九年班漢穆出版其大著「**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一八九八年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合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的一項，應是不容置疑的。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梁氏在南開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翌年出書），所受西方史學方法的影響，極爲明顯。如梁氏云：

「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徵：其一爲客觀的資料之整理——疇昔不認爲史蹟者，今則認之；疇昔認爲史蹟者，今或不認。舉從前棄置散佚之跡，鉤稽而比觀之，其夙所因襲者，則重加鑑別以估定其價值。如此則史學立於『眞』的基礎之上，而推論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爲主觀的觀念之革新——以史爲人類活態之再現，而非其疆跡之展覽；爲全社會之業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譜錄。如此，然後歷史與吾儕生活相密接，讀之能親切有味；如此，然後能使讀者領會團體生活之意義以助成其爲一國民爲一世界人之資格也。歐美近百數十年之史學界，全向於此兩種方嚮以行。今雖僅見其進未見其止，顧所成就則既斐然矣。」[24]

梁氏所講中國歷史研究法，即以西方史學中客觀的資料之整理與主觀的觀念之革新兩特徵爲中心，尤其是前者。如說史料一章，將史料分爲在文字記錄以外者與在文字記錄以內者兩種，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包括現存之實蹟、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三類；在文字記錄以內者，包括舊史、關係史蹟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羣籍、類書與古逸書輯本、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金石及其他鏤文諸類。此與班漢穆史源學的二體三元說，極爲接近。班氏所謂二體，是指文字的記載與古物的遺留；所謂三元是指口頭傳說、文字記載與事實自身之遺留。班氏以後，西方史學家作史料的分類，大致不出此範圍。梁氏去歐洲後，多少會受到啓示的。再如梁氏將史料分爲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這也是班氏對史料的一種分類。

談到「史蹟之論次」，梁氏曾列舉一程序：

第一：當畫出一「史蹟集團」以爲研究範圍。

第二：集團分子之整理與集團實體之把捉。

第三：常注意集團外之關係。

第四：認取各該史蹟集團之「人格者」。

第五：精研一史蹟之心的基件。

第六：精研一史蹟之物的基件。

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

第八：觀察所緣。[25]

這顯然已超出中國傳統史學的範圍，而係受西方史學的影響了。

2. 胡適輸入西方科學治史方法

[24]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

[25] 同上第六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梁啓超沒有直接閱讀英文、德文、法文等書籍的能力，他輸入西方史學，要輾轉經過第三者作媒介。因此他所輸入的，難免流於浮泛疏略。這也充分代表了梁氏在學術上的特殊性格。

梁氏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同時，國內已有不少人更徹底地輸入西方治史方法，胡適已在北京大學講西方的科學方法，何炳松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歷史研究法一課，用美國史學家魯賓孫（J. H.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 1912）原本作課本，民國十年新史學譯本也已問世了。今先言胡氏所輸入的西方科學方法。

西方科學治史方法的輸入中國，自民國成立以後開始，而胡氏實居首功。顧頡剛在談到西方科學治史方法的輸入時曾云：

> 「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爲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眞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眞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歷史的眞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系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26]

又云：

> 「民國以來，西洋的治學方法和新史觀不斷的輸入，更予人們以莫大的啓示。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講學，常根據他從西洋得來的治史方法，考證中國歷史上的問題，於是古代史的威信更爲動搖。頡剛等身逢其會，便開始提出古史上諸問題加以討論，『古史辨』便在這種情態之下出現了。」[27]

胡氏於五四運動以後，在北京大學講西方科學的治史方法，是當時極爲轟動的大事，其影響於史學界，也至深且鉅。胡氏自言其思想的來源，一是赫胥黎的存疑主義（agnosticism），一是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

>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28]

> 「達爾文與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的『存疑主義』（agnos-

[26]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頁二～三。
[27] 同上頁一二六。
[28] 胡適文選「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icism），存疑主義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直譯爲『不知主義』。孔丘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話確是『存疑主義』的一個好解說。但近代的科學家還要進一步，他們要問，『怎樣的知，才可以算是無疑的知？』赫胥黎說：『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這是存疑主義的主腦。……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義』的。……到了達爾文出來，演進的宇宙觀首先和上帝創造的宇宙觀起了一個大衝突，於是三百年來不相侵犯的兩國就不能不宣戰了。達爾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來的證據。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說。……赫胥黎是達爾文的作戰先鋒，從戰場上的經驗裏認清了科學的唯一武器是證據，所以大聲疾呼的把這個無敵的武器提出來，叫人們認爲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從這個『拿證據來』的喊聲傳出以後，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哲學方法上的大革命。於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哲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就一變而爲十九世紀末年的實驗主義了。」[29]

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則特別注重其方法論：

「(1) 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2) 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 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眞理的唯一試金石。……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才是眞進化。」[30]

胡氏以上面的思想作基礎，擴而及於治史，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31]

紙上以外的材料，尤爲所注重：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

[29] 同上「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30] 同上「杜威先生與中國」。
[31] 同上「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着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揑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却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輕氣養氣；但我們用人功把水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以證實水是輕氣和養氣合成的。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却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據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據；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裏，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在冬天。原來在人身上的，他可以移種在兎身上，狗身上。畢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了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爲簡單；太少了的，他可以用人功培植增加。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爲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32]

胡氏所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變成了近人的口頭禪；他的注重紙上以外的材料，尤有極深遠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派的史學（詳後），卽是主要在他的影響之下形成的。

總之，胡氏所輸入的西方科學治史方法，風靡了中國近代史學界，此與這一套方法的新穎性有關，亦與胡氏的聲望地位有關。卽如疑古學派的盛行，亦與之有相當的關係，如疑古學派大師顧頡剛云：

「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學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僞，要去研究僞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33]

「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

[32] 同上「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33] 古史辨自序。

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于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歡喜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34]

由此可以看出胡氏對疑古學派所發生的影響了。

3. 何炳松的譯述

何炳松於民國九年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歷史研究法一課，以魯賓孫的**新史學**英文原本作課本，同時進行翻譯的工作，民國十年譯成問世。朱希祖曾述其始末云：

「民國九年的夏天，我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的主任，那時我看了德國 Lamprecht 的近代歷史學，他的最要緊的話，就是：『近代的歷史學，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現在歷史學新舊的論爭，就是研究歷史本於社會心的要素？還是本於個人心的要素？稍嚴密一點說起來，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呢？還是在少數英雄？』Lamprecht 的意思，以爲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爲基本科學。我那時就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級，先把社會科學學習，做一種基礎——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再輔之以生物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古物學等。特別注意的，就推社會心理學。然後把全世界的史學綜合研究，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學的發展。那時史學系中又有歷史研究法一課，就請金華何炳松先生擔任。何先生用美國 Robinson 所著的**新史學**原本做課本，頗受學生歡迎。我那時就請何先生把**新史學**譯做中文，使吾國學界知道新史學的原理。不到一年，**新史學**一書果然譯成。」[35]

何氏自言**新史學**的翻譯云：

「Robinson 博士所說的話，雖然統是屬於歐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們中國研究歷史的人的礪砥。我在北京大學同北京高師裏面，曾用這本書做講授西洋史學原理的教本。同學中習史學的人，統以這本書爲『得未曾有』。但是這本書的原本，用意既然深遠，造句又很複雜，所以同學中多『歎爲難讀』。今年春間，高師同學江君勉若願用他的求學餘閑，來幫我從事於這本書的翻譯。我們兩人就從本年（民國十年）二月起着手進行，差不多經過六個月，才將這書譯完。」[36]

「我翻譯這本書的動機，實在發生在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逖先先生，同我的同學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慰慈博士兩人的慫恿。譯成以後，他們兩人又代我校閱

[34] 同上。

[35] **新史學**朱序，此序作於民國十年八月十日。

[36] **新史學**譯者導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遍，給我許多有價值的批評同改正。後來我的同學北京大學哲學教授胡適之博士，再代我細細的校閱一番。」[37]

「我譯完這本書的時候，在民國十年的夏天。後來我將譯本送給適之先生去看；他就發現了而且改正了好幾點錯誤。最後我再拿回來根據原本一字一字的校正，竭力希望我的譯本能够『一筆不苟』；——我雖然知道這是不容易完全做到的。十一年春間，適之先生又將這本書提出北京大學出版委員會，而且通過了爲北大叢書的一種。」[38]

可知**新史學**一書的譯成，當時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與何氏的同學張慰慈有鼓舞的作用；參與翻譯的有何氏的弟子江奐若；參加意見的，有當時已享大名的胡適；翻譯的時間，約爲六個月(從民國十年二月開始)；使用的場合，爲北京大學與北京高師。

何氏所譯**新史學**，爲中國史學界所譯有關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的第一部書。在中西史學交流史上，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此書出版後，對中國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誠如朱希祖所云：「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是陳腐極了，沒有一番破壞，斷然不能建設。何先生譯了 Robinson 這部書，是很合我國史學界的程度，先把消極的方面多說些，把史學界陳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擴清了，然後慢慢的想到積極的建設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譯了這部書，是很有功於我國史學界的。」[39] 在一九一二年魯賓孫的**新史學**在美國問世的時候，曾轟動美國史學界。然此書的譯本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或不下於在美國所發生的影響。此皆非作者與譯者始料所能及。

中國史學界重視社會科學，係受何氏所譯**新史學**的影響。魯賓孫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有不可須臾離的關係：

「『新史學』要脫去從前那種研究歷史的限制。新史學這樣東西，將來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五十年來的種種發明，已經將我們對於人類的來源，進步同希望種種觀念革命了。五十年來沒有一種科學，無論是有機的或無機的，不受重大的變化，而且有許多新科學增加出來，他們的名字，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家亦都不知道。史學這種學問，當然免不了混入這革命潮流裏面去。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有許多歷史家，還不知道歷史有革命的必要。無怪現在普通人對於歷史的範圍同性質的觀念，還是陳腐的很。

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歷史不是一種停頓不進

[37] 同上。

[38] **新史學**譯者再誌。

[39] **新史學**朱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的學問，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評、融化新資料，他定能進步的；歷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着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而且歷史這種東西，將來一定能够在我們知識生活裏面，佔一個比從前還要重要的位置。」[40]

「歷史家始終是社會的批評者同指導者，他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試驗他們一下。歷史家的事業，如此的有趣，如此的廣大，所以歷史家將來一定慢慢的能够專心致志的去研究歷史，將來總要脫離文學的關係。因爲歷史家將來的目的，比詩家或戲曲家還要高尚，還有希望，這種目的對於歷史家思想的要求同表示能力的要求，比對於文學家還要急切。」[41]

「現在研究歷史的人，不但應該急起直追適合自己於一般智識狀況中的新分子，而且應該快快表明他們對於各種關於人類新科學的態度。各種新科學，因爲利用進化原理的緣故，所以進步得異常的快，而且能够改正一般歷史家所下的斷語，解除了許多歷史家的誤會。所謂關於人類的各種新科學，我以爲最重要的就是廣義的人類學、古物學、社會的和動物的心理學和比較宗教的研究。經濟學對於歷史已經很有影響，至於社會學，照我看來，不過是對於人類的一種很重要的觀擇點，並不是一種關於人類的新發明。各種新的社會科學各去研究人類的各方面，已經將我們許多歷史家慣用的歷史名詞的意義大大變更了——如種族、宗教、進步古人、文化、人類天性等。他們推翻了許多歷史家的舊說，解釋了許多歷史家所不能解釋的歷史上的現象。」[42]

「歷史家和地質學家、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一樣，即使沒有工夫去研究各種科學的原理，也不能不利用各種科學家有關係的學說。歷史家不一定要作人類學家或心理學家，才可以利用人類學和心理學的發明和學說。這種發明和學說，對於歷史家可以貢獻一種新眼光和新解釋，可以幫助歷史家矯正了許多謬見，消滅了許多貫澈歷史著作裏面舊的幻想。最要緊的，歷史學家應該絕對的懷有史心，利用進化的學說；而且要承認雖然以歷史家自居，以歷史家自負，自己的態度和方法，在所有研究人類的學者裏面，還是最不是歷史的。

有時他種科學的學說，固然未免言過其實一點，他們所貢獻的歷史解釋，也往往不能免歷史家的反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往往走得太快，而且太不謹愼；所以有許多歷史家因此就不免有過度的保守，就絕對的不去想了。但是無論如何，想得太多還是冒險。假使把他種和歷史同盟的科學思想，好好的利

[40] 新史學頁一四〜一五。
[41] 同上頁四三。
[42] 同上頁五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起來，很可以大大的增加歷史研究的力量和範圍，使研究歷史的結果，比自古以來還要有價值。」[43]

很明顯的魯氏希望史學能够經世，「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希望史學家能够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以期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試驗一下；希望史學與文學脫離關係，認爲史學家的目的，比詩家或戲曲家還要高尚，還有希望。這大致是魯氏的「新史學」，而希望史學家綜合社會科學的結果，是其重心。民國九年，在魯氏新史學的理論基礎上，北京大學就將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加到史學系課程裏面去了。自此中國史學界重視社會科學與史學的關係。李璜在一篇講稿中說：

「現在一個研究歷史的學生，特別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生，要想不受古人之欺，而又能得個歷史事變的統整觀念，便該常注意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這差不多已成了一般的定論，而無庸疑義了。因此大學歷史系的課程裏，都有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統計學、宗教學，以至社會學等等科目。」

「從前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是人，而現今社會學家研究的對象也無非是人。不過從前歷史學家眼中的人都大半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子』，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的；所以從前歷史學家便多半目不斜視，專從這些所謂『歷史人物』身上用工夫。社會科學家眼中的人，他便處處都認爲受了環境的支配：他的生理，他的心理，他的日常生活和特別行爲，都被認爲與他的前後左右的社會有關係。於是社會科學家雖把人的能力看小了一些，却把人的研究擴大了許多。歷史學家也就不能不受這種影響，將他的研究範圍擴大起來。」

「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彼此交互影響的關係，在近今是幾乎分不開的：社會科學每有所見，必定立刻要影響到歷史科學，而歷史科學每有所得，也必定要影響到社會科學。一種科學的成立，本來要（一）正確有據，（二）觀察有方，（三）歸納得例。現今社會科學與歷史科學如果要眞正進於科學之域，也必須辦到這三點。而在這三點上，一部份要靠歷史學家的用力（特別在正確有據上面）。這兩部份的力量可以說合則兩利，分則兩損。此所以社會科學自孔德而後，大半都主張歷史的研究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打成一片，而近今歷史學家除了少數不改舊態以外，大半都願與社會科學家携手前進。」[44]

---

[43] 同上頁六四～六五。

[44] 以上皆見李璜著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民國五十年七月初版），頁一至二六。李氏於序中說：「這本小書，原是我民十三至十五年在武昌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西洋史與社會學教授時，爲學生講演的幾篇講稿合成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代中國史學界大致接受了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治史的這一西方史學傳統，這是一種新史學，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所從未出現過的。雖然中國史學家實際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治史者仍然佔極少數，但是在大原則上是接受了。

繼**新史學**之後，何氏又譯古赤（G. P. Gooch, 1873-1968）的**十九世紀之史學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13），班茲（H. E. Barnes）的**史學史**[45]，紹特韋爾（J. R. Shotwell）的**西洋史學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1939，再版時，更名爲 The History of History, 1950）。古赤之書，譯本未克問世，其譯稿是否完成，亦未可知。班茲、紹特韋爾二氏之書，譯本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何氏對其所從事的翻譯事業，在自序其所譯紹氏的**西洋史學史**中曾云：

「譯者竊不自量，嘗思致力於中國史學史之編輯，以期於吾國之新史學界稍有貢獻。唯覺茲事體大，斷非獨力所能奏功。且此種研究爲吾國學術上之創舉，尤非先事介紹現在西洋新史學之名著不足以資借鏡。譯者近年來所以有編譯西洋史學叢書之計劃，其故蓋卽在此。

譯者抱此宏願業已數載於茲，終以謀生未遑，無從下手。四年之前，譯者曾一時掌教於上海光華大學，無意中得一史學同志郭斌佳君其人。郭君本好學深思之士，自願於課餘之暇以全力贊助譯者從事於西洋史學之介紹。譯者聞之，不禁大喜過望，遂與之合譯此新出之名著，蓋已費時一載矣。

今春郭君應清華大學之聘，擔任助教，因得與北方羅志希朱逖先諸史學前輩游，學業益進，不日且將負笈北美以求深造。半年以來，彼仍輔助譯者翻譯古赤氏**十九世紀之史學與史家**一書，至今亦已譯成過半，不期年當可脫稿。吾人得此二書，則譯者計劃中之西洋史學叢書，可謂規模粗具矣。豈非平生一大快事哉！」[46]

何氏擬致力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而先從事於西洋新史學名著的介紹，計劃編譯西洋史學叢書，其識見與氣魄，皆令人讚佩。其所譯紹特韋爾的史學史，在當時頗負盛名；其已進行翻譯而未出版的古赤之書，則迄至今日，尙爲談十九世紀史學的權威作品。

純粹翻譯以外，何氏尙以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相比論，其民國十六年所寫成的**歷史研究法**與民國十七年所寫成的**通史新義**，都是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觀其於**歷史研究法**

[45] 何炳松未將原書之名列於書端（此爲何氏往往犯的毛病，譯書者寧有不當將原書名揭出者乎？），疑爲某百科全書中有關西洋史學史的一條。惟決非班茲所著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一九三九年初版時名爲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九五四年更名。）

[46] **西洋史學史譯者序**，此序作於民國十八年八月七日。

的序中說：

「吾國史籍，雖稱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則寥若晨星。世之習西洋史者，或執此爲吾國史家病。殊不知專門名家之於其所學，或僅知其然而終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然而後推知其所以然。此乃中西各國學術上之常事，初不獨吾國學者爲然也。西洋史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過二百年來事耳。然如法國之道諾（P. C. F. Daunou），德國之特羅伊生（J. G. Droysen），英國之夫里門（E. A. Freeman）輩，或高談哲理，或討論修詞，莫不以空談無補，見譏於後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僅有二書，一爲德國格來夫斯法爾特（Greifswald）大學教授朋漢姆（Ernst Bernheim）之**歷史研究法課本**（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於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一爲法國索爾蓬（Sorbonne）大學教授朗格羅亞與塞諾波（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二人合著之**歷史研究法入門**（Introduction aux E'trudes Historiques），出版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兩書之出世，離今均不過三十餘年耳。

吾國專論史學之名著，在唐有劉知幾之**史通**（中宗景龍時作），離今已一千二百餘年。在清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乾隆時作），離今亦已達一百七八十年。其議論之宏通及其見解之精審，決不在西洋新史學家之下。唯吾國史學界中，自有特殊之情況。劉、章諸人之眼界及主張，當然不能不受固有環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間有不合西洋新說而少之，是猶譏西洋古人之不識中國情形，或譏吾輩先人之不識飛機與電話也，又豈持平之論哉？

德國朋漢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學說之大成也。法國郎格羅亞、塞諾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採取最新學說之精華也。一重承先，一重啓後，然其有功於史法之研究也，則初無二致。吾國先哲討論史法之文學，亦何嘗不森然滿目？然今日之能以新法綜合而整齊之者，尚未有其人耳。」

「著者之作是書，意在介紹西洋之史法。故關於理論方面，完全本諸朋漢姆、郎格羅亞、塞諾波三人之著作。遇有與吾國史家不約而同之言論，則引用吾國固有之成文。書中所有實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國讀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見解之大體相同。初不敢稗販西籍以欺國人，尤不敢牽附中文，以欺讀者。」

於**通史新義**自序則云：

「吾國近年來史學界頗受歐化潮流之激盪，是以努力於通史編纂者頗不乏人。其對於西洋史學原理之接受，正與一般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新文學家同，一時頓呈饑不擇食活剝生吞之現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義例因之遂充斥於吾國現代之史著中。彼曾習統計學者，以爲研究歷史應用統計法焉；彼曾習生物學者，

以爲研究歷史應用進化說焉；彼曾習自然科學者，以爲研究歷史應用因果律焉；彼曾習經濟學者，以爲研究歷史應用經濟史觀焉；彼曾習論理學者，以爲研究歷史應用分類法焉。一時學說紛紜，莫衷一是，大有處士橫議百家爭鳴之概，誠不可謂非吾國史學界復興之朕兆也。」

「著者之作此書，唯一宗旨在於介紹西洋最新之通史義例，蓋因其依據各種最新人文科學研究而來，較吾國固有者爲切實而適用，足備國內史家之採擇；初不敢因其來自西洋，遂奉之爲金科玉律也。此外著者不揣固陋，並欲藉此書以與國人商榷三種管見焉：卽史料與著作應分兩家而後通史之觀念方明；現代吾國流行之通史義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獨尊是也。一得之愚，或未盡當，幸覽者有以糾正之。

本書凡分兩編。上編計分十章，專論社會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訂與事實編比之理論及應用，均加以系統之討論。下編計分十一章，專論社會史研究法，凡社會通史之著作及其與他種歷史之關係，均加以淺顯之說明，同時對於其他各種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義例，亦復隨處加以相當之估值。……

至於本書所述之原理，十九採自法國名史塞諾波所著**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Ch. Seignobos: 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 aux Science Socials）一書。著者雖略有疏通證明之功，終未敢掩襲他山之美。」[47]

是何氏**歷史研究法**一書，完全本於班漢穆（卽朋漢姆）、朗格諾瓦（卽郎格羅亞）、瑟諾博司（卽塞諾波）三人之說；**通史新義**一書，則十九採自瑟諾博司另外一部名著**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遇有與中國史學方法相通之處，則作比論，以互相發明。是何氏已頗能會通中西史學了。

4. 傅斯年與西方科學治史方法的輸入

新歷史考據學亦卽科學的歷史學是民國以來中國史學的主要潮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此一潮流的重心。治史不重寫史，而重考史；視史料爲史學的全部，擴充史料的範圍，增加批評史料的工具；上窮碧落，下及黃泉，目的在尋找史料；語言學、文字學、考古學、生物學等，也無一不被視爲批評史料解釋史料的工具學問。此一潮流，自然有乾嘉時代歷史考據學的傳統，也深受西方科學治史方法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蔡元培首先對史學下一新的定義：

「史學本是史料學，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史料中。」[48]

既視史學爲史料學，於是特別注重史料，尤其是直接的史料：

[47] 按何炳松作此序於民國十七年雙十節。

[48] 明清史料序。

「歷史中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有很大的分別，以前治史者之濫用間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應該是以後治史學者所急當糾正的。例如**遼史**之成由於刪契丹列朝之實錄，刪實錄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核出來的。這猶可說**遼史**成於胡元之朝，脫脫所領之局做不出學術上的大業。然試看馬班以後諸紀傳史家，那一位不是在那裏抄實錄，抄碑傳？那一位曾經充分利用過直接史料？我們展讀一部紀傳的史，每每感覺全是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內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見，這豈不是刪削實錄碑傳的結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論世的菁華遺略嗎？即使那些做實錄做碑傳者，並沒有忌諱，沒有成見，沒有內外，已因和我們觀點之不同，他們所據直接材料以刪削者不正合於我們的要求，何況做實錄者本有所諱，做碑傳者本專務表揚，則有意的顛倒，乃至改換，是不可免的呢！史料愈間接愈不可靠，這道理本是極明顯的。假如民國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學的要求不能以刪削官書碑狀滿足之，則這些大庫檔案正該由他們調去整理的。然而他們不作，我們希望我們這次的整理檔案開些以後注重直接史料的風氣。」[4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輾轉收購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以及積極的加以整理刊印，可以說都是在院長蔡氏這種重視直接史料的觀念下所促成的。

繼蔡氏之後，胡適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他所輸入的西方科學治史的方法，史語所充分的予以應用。繼胡氏之後對史語所影響最大最直接的是傅斯年。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一月史語所成立，到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十二月傅氏逝世，他一直擔任所長的職務，史語所在史學上的成就，主要應歸功於他的領導。

傅氏在北京大學曾教授「史學方法導論」一課，其所擬之目為：

第一講　論史學非求結論之學問
　　論史學在「敍述科學」中之位置
　　論歷史的知識與藝術的手段
第二講　中國及歐洲歷代史學觀念演變之綱領
第三講　統計方法與史學
第四講　史料論略
第五講　古代史與近代史
第六講　史學的邏輯
第七講　所謂「史觀」[50]

[49] 同上。

[50] **傅孟眞先生集中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以上的擬目，可以看出傅氏介紹了一部分西方的史學。惟七講中現存者僅爲第四講史料論略。「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是這一講裏很惹人注目的話，也是傅氏對史學的一貫看法。

史語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刊載傅氏「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此文一出，決定了以後史語所所走的路線，迄至今日，還沒有什麼重大的修改。

傅氏首先認爲史學不是著史：

「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51]

歷史的研究，傅氏認爲應當遵守三個標準：(1) 直接研究材料，(2) 擴張研究的材料，(3) 擴充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傅氏對以上三者都逐一加以發揮，並且很堅定的說：

「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的找東西。」

民國以後，迄於抗日戰爭以前，史料上有幾項重要的發現，第一爲安陽的甲骨，第二爲敦煌千佛洞的手寫卷子，第三爲西北邊塞的漢簡，第四爲清代內閣大庫及軍機處的檔案。這四種新史料中，安陽甲骨是由史語所考古組李濟和董作賓領導下所發掘的結果。清內閣大庫的檔案係由史語所輾轉購得[52]，**明清史料**四十冊卽由其中輯出。敦煌卷子方面，史語所刊行的有陳垣的**敦煌劫餘錄**和劉復的**敦煌掇瑣**。漢簡方面，史語所刊行的有勞榦的**居延漢簡考證**。這些都是史語所的貢獻，也都是在傅氏領導下所進行的。

傅氏輸入西方科學治史方法，可以從李濟的一段話透露出來：

「以歷史研究所爲大本營在中國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面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史，都有澈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

[51] 同上。

[52] 詳見李宗侗**史學概要**第十七編第四章內閣檔案。

識，在很短的時間內聚集了不少能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53]

5. 其他。[54]

此一時期班漢穆的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與朗格諾瓦、瑟諾博司合著的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皆經譯成中文。這比何炳松僅取其理論而以中國實例作疏通證明，已更徹底了一步。班氏的書，爲陳韜所譯，譯名爲**史學方法論**，出版的時間，約在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之間。[55] 朗、瑟二氏之書，爲李思純所譯，譯名爲「**史學原論**」，出版於民國十五年。被視爲西方史學方法論鼻祖之作，一旦譯爲中文，誠爲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史上的大事。

陳韜翻譯班氏「**史學方法論**」的詳情，不可得而知。[56] 李思純則於「**史學原論**」前冠以弁言云：

> 「**史學原論**一卷，著者朗格諾瓦、瑟諾博司二氏。朗氏法蘭西國家藏書樓主任，瑟氏巴黎大學歷史教授也。是書以一八九七年八月出版於巴黎，書雖稍舊，然遠西後出談歷史方法之書尚未有逾此者。
>
> 吾讀此書在一九二〇年之秋，於時瑟諾博司先生在巴黎大學文科講授近代史及歷史方法。吾自是年秋迄於一九二一年冬，凡閱時一年，朝夕挾書冊親受先生講課。一九二二年三月，遊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樓，日長多暇，乃以是書法文原本及英國 G. G. Berry 氏譯本參酌譯之，日成數章，二月而畢業。棄置篋底復年餘，今夏歸國居南京，乃取舊稿刪訂潤色之。間於篇中徵引事實有不能明者，爲附註於章後焉。
>
> 論歷史方法之專書，世不多見。英美所著者，有 Robinson 氏之 New History，有 Vincent 氏之 Historical Research，有 McMurry 氏之 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有 Woodbridge 氏之 The Purpose of History，有 Nordain 氏之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有 Seligman 氏之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有 Gooch 氏之 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19th Century〔按應作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有 Barn 氏之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 等書。然以較此書體大思精，咸有遜色。法國史家 Fustel de Coulange 氏成書曰『**歷史搜討之數問題**』

---

[53] 見傅樂成著傅孟眞先生年譜。

[54] 民國以來，西方唯物史觀的輸入，自爲史學上的一件大事。惟此一在西方學術界極具勢力的史觀，東來中國後，完全喪失其學術性，變成政黨的工具，淪於教條的教條，故本文不予介紹。

[55] 陳韜所譯班漢穆的史學方法論，筆者所看到的本子，爲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八月臺一版」本，初版於何時，有待確考。

[56] 陳韜譯班氏之書，據姚從吾師生前相告云：「陳氏可能根據日譯本翻譯。」

(Recherche des Quelque Problems d' Histoire)，雖其書甚美，然所論多具體事實而少抽象方法。本書著作者瑟諾博司先生於後此數年更成一書曰『**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方法**』(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 aux Science Socials)，其書亦佳，然特本書之撮要節本而已。故討論抽象史法而體大思精之作，本書應首屈一指也。

吾國舊史繁頤，史學之發達較他國爲美備，關於諮訪蒐輯校讐考證之事，與夫體例編次文辭名物之理，莫不審晰入微，措施合法。劉知幾氏『**史通**』，章學誠氏『**文史通義、校讐通義**』，其最著之作也。二氏所作，其間探討之道，辨晰之事，東西名哲，合軌符轍，無有異致。本書所陳，或符前哲舊言，或出遠西新諦。」

「斯譯參酌英法兩本，比較爲之，或有出入，其有與英譯辭語不盡符合者，則法文原本可覆按也。」

是李思純曾於巴黎大學親受瑟諾博司講授，又參酌英文法文兩種本子翻譯，此爲其翻譯的值得稱道處。

稍後董之學又譯班茲的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譯名爲「**新史學與社會科學**」，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黎東方譯施亨利(Henri S'ee)的 Science et Philosophie d'e I'Histoire，譯名爲「**歷史之科學與哲學**」，民國十八年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李璜曾出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一書，中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歷史學方法概論、歐洲文化史導言、歷史教學法旨趣四篇，爲李氏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在各大學的演講稿，主要介紹瑟諾博司之說。李氏在序中說：

「這本小書，原是我民十三至十五年在武昌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西洋史與社會學教授時，爲學生講演的幾篇講稿合成的。當時在青年學生中，革命的政治風氣雖然很盛，但是大學生的研究興趣同時也非常之高。每一系的學生都要組織學術研究會，請教授們爲他們作課外講演。當時我感到學生們這種努力是難得的。應該予以鼓勵的。因此我所擔任的正課鐘點雖已不少，但對這種課外的講演，也不願隨便應付，總希望能趁此機會，爲學生們的研究工作，指示出一些途徑與方法。——這本小書中的幾篇講稿，便是爲研究歷史學與社會學，說明下手研究所應注意的門徑所在而寫成的。」

四、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第三期——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

在此十二年中，爲西方史學輸入中國最緩慢的時期。八年的抗戰，四年的戡亂，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學術的發展，受到最大的影響。西方史學的輸入不能與其他時期相比，自爲極自然的現象。

以寫**中國史綱**享盛名的張蔭麟，是此一時期輸入西方史學的功臣之一。

張氏曾負笈美國，習西洋哲學、社會學，而以史學爲歸宿。歸國後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教席。他先後發表過「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57]、「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58]、「評近人顧頡剛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59]等幾篇介紹西方史學的文章。在「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一文中，介紹了不少西方觀察史料批評史料的方法。在「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中，由談西方歷史哲學而涉及西方史學。「評近人顧頡剛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中則云：

> 「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茲于討論之前，請徵法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氏論默證之成說以代吾所欲言。其說曰：
>
> 吾儕于日常生活中，每謂『此事果眞，吾儕嘗已聞之。』默證卽根此感覺而生。其中實暗藏一普遍之論據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實，果眞有之，則必當有紀之之文籍存在。
>
> 欲使此推論不悖於理，必須所有事實均經見聞，均經記錄，而所有記錄均保完未失而後可。雖然，古事泰半失載，載矣而多湮滅，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默證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條件悉具時始可應用之。
>
> 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爲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倘若載籍有湮滅，則無結論可得矣。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十九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下略）
>
> 是以默證之應用，限於少數界限極清楚之情形：（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爲有系統之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例如塔克多 Tacitus 有意列舉日爾曼各民族 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國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爲二者所未舉，則足以證明當時無之。）（二）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于作者之觀念中。（例如倘法蘭克 Frankish 民族

[57] 學衡第六十二期（民國十七年三月）。
[58] 思想與時代第十九期。
[59] 學衡第四十期（民國十四年四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定期集會，則 Gregory 之作**法蘭克族諸王傳**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見 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 G. Berry）

此爲張氏介紹西方史學中的默證方法。

以上張氏介紹西方史學的幾篇文章，都是在早年寫成的（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間）[60]。其成熟時期的作品，則爲民國三十年出版的**中國史綱**，這是在融會西方史學後所寫出來的一部中國新史。「（一）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敍述的成文，卽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二）選擇少數的節目爲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敍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爲背景；（三）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61] 此顯然係得自西方的寫史方式。張氏又在自序中舉出了五種取材的標準以及四個組織材料的範疇，所謂新異性的標準 (standard of novelty)，實效的標準 (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文化價值標準 (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訓誨功用的標準 (standard of didacticutility)，現狀淵源的標準 (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是五種取材的標準；所謂因果的範疇，定向發展的範疇，演化發展的範疇，矛盾發展的範疇，是四個組織材料的範疇。[62] 這五種標準，四個範疇，不容置疑的是張氏主要從西方史學中歸納出來的。

此一時期楊鴻烈的出版「**史學通論**」[63]、「**歷史研究法**」（民國三十三年出版），陸懋德的出版「**史學方法大綱**」（民國三十四年出版），都將部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楊著「**歷史研究法**」所引有關西方史學著作約有：

Eduard Meyer, Zur Theorie and Methodike der Geschichte

F. M. Fl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 Scot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R. L. Marshall,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Documents

Daumon, Cours d'etudes Historique

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E. Bernheim,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

[60] 張氏「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寫成於何時，頗難確定。思想與時代係轉載之。

[61] 張蔭麟上古史綱初版自序。

[62] 參見中國史綱自序。

[63] 楊鴻烈所著史學通論係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筆者於民國六十四年春間曾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圖書館見其書，國內圖書館似未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著所引則有：

B. Croc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K. Lamprecht. What is History?
J. H.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 Scot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F. Harrison, The Meaning of History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H. E. Barnes, History and Prospect of Social Sciences
H. Taylor, History as a Science
F. M. Fl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F. J. Teggart, Theory of History
S. A. Rice,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s
A. Wolf, Essential of Scientific Method
Ch. Seignobos, 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 aux Science Socials
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A. Johnson,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C. G. Crump,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J. J. Jusser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anglois and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R. A. Seligm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 E. Barnes,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陸氏且於自序中說：

「近世歐美各邦人士，本其科學方法，以治史學，故其成績往往過於吾國。至於德人柏爾亥謨氏及法人塞音奴朴氏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國前人所及。此外英美學者亦多採取其說以著書，故西方專言史法之作，多能臚列條文，與人以便利。夫舉艱深之理，而示以坦易之途，此固科學之所尙，而爲吾人之所求者也。余昔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均曾主講史學方法，每於援引吾國舊說之外，多採取西人名著，以爲補助。蓋學問之道，無所謂中西，但取其長而求其是而已。及余避地西北，仍以是爲教。友人杜毅伯先生見而善之，因囑獨立社主人購其講稿，印行於世，此茲編之所以刋布也。余又聞法人塞音奴朴氏之言曰：『社會科學是用史學方法。』余謂史學雖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而其研究之資料，固同爲根據個人之觀察，及根據他人之記載，故其所用之方法一也。方

法不精，則根據失實，而所得之因果亦不可信，此固現代治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者之通病也。」[64]

此外周謙冲曾譯沙爾非米尼(Gaetano Salvemimi)的「**史學家與科學家**」(Historian and Scientis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一書，約於民國三十二年出版。[65] 周氏譯此書的目的，可於其「譯者敍言」中看出來：

「我在各大學授『歷史方法』有年，諸生極感參考書的缺乏。這本書可當『史學概論』和『社會科學概論』讀，也可作『史學方法』的參考書讀。」

五、近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的輸入中國——民國三十九年迄於今日（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六年）

自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大陸變色，政府播遷臺灣以來，到今日已將近三十年。在這將近三十年中，我政府所直接統轄的土地，雖只限於一隅，然而在政治上却極度安定，在經濟上有最迅速的發展，這是對史學發展極有利的一個環境。加以大陸上的慘變，國際政治上的風雲，史學所受外來的刺激，較任何一個時代爲深。在有安定環境與外來刺激的兩大因素下，史學有大發展的可能。就西方史學的輸入而言，已非前一時期所能比擬。

在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學的張致遠、姚從吾、沈剛伯、劉崇鋐諸教授，是此一時期輸入西方史學極重要的人物。

張致遠先生留學德國，深受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史學的影響。歸國後應中央大學之聘，講授西洋史、西洋史學史與西洋外交史。大陸淪陷，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講西洋史學史與西洋近世史，並以英國史學家費雪（H. A. L. Fisher）的「**歐洲通史**」(A History of Europe) 爲藍本，編著「**西洋通史**」三冊，頗流行於史學界。另著「**史學講話**」一書（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初版），中分史學的涵義及其問題、史學的研究範圍、史學方法綱要、歷史與人文教育、陶恩培論文化的起源、西洋外交史研究六章，前三章主要介紹班漢穆的史學理論及方法。此外單獨發表的論文，如歌德與近代歷史思想的起源、最近幾十年來的德國史學、蘭克的生平與著作、曼納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66]等，均與輸入德國史學有關。

傾畢生歲月致力於輸入德國史學方法的，應首推姚從吾先生。姚先生於民國十一年

[64]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陸懋德於西北大學作此序。

[65] 筆者所見周譯**史學家與科學家**一書，爲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本，未注初版年月，僅注民國五十六年六月臺一版。周氏作「譯者敍言」於民國三十二年，故略斷定其出版於是年。

[66] 以上諸文，均收入**張致遠文集**中。

留學德國，民國二十三年歸來，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蒙古史及歷史方法論。以後在西南聯大，在河南大學校長任內，以及在臺灣大學的二十年，每年都開歷史方法論這門課，這將近延續了四十年。在課堂上，他以一半以上的時間，介紹德國從蘭克到班漢穆的史學方法。北大時代，曾將班氏「**史學導論**」譯成中文，用爲參考講義。在臺大，每年都印發一部分講義，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德國史學方法。如「近代歐洲歷史方法論的起源」、「略論直接史料中幾類最佳的史料」、「略論歷史學的補助科學」，多採用班氏之說，而濟以國史的例證。臨終前他曾將講義「近代歐洲歷史方法論的起源」改寫後發表在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二期上面，詳言德國尼博兒、蘭克的治史方法，這是他將歷史方法論講義改寫後發表出來的唯一的一篇。今其遺著**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一冊歷史方法論**，卽其講義的化身。[67]

沈剛伯先生早年負笈英倫，歸國後講授英國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文化史近五十年，間取國史與西史相印證。如「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一文，[68] 卽將相去遙遠的希臘史學與中國春秋至西漢時代的史學，相與比論。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一期「卷頭語」爲沈先生所執筆，專就西方近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申論中國今日治史應循的途徑，「建立一新而正當的史學以端人心而正風俗。」「講求『史義』以根絕一切史演之學，並培養『史識』以補考據之不足。」[69] 均爲發人深省之語。

劉崇鋐先生留學美國，歸國後最有心輸入西方晚近新史學，於所習開的西洋通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美國史等課外，每喜增開西洋史學名著一類新課。如於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間，卽增授「西洋史學名著選讀」，一九三八年奈芬司（Allan Nevins）出版的「**史學入門**」（The Gateway to History），被採作教本之一，當時筆者是班上的學生，深覺獲益良多。一九六一年卡耳（E. H. Carr）出版其極爲風行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一書後，翌年秋天起，劉先生卽爲臺大歷史系學生介紹其書。臺大歷史系學生較能接受西洋新史學知識，劉先生的熱心介紹，應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此一時期出版的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論著，其頗能採納西方史學者，約有許冠三的「**史學與史學方法**」，許倬雲的「**歷史學研究**」，胡秋原的「**史學方法之要點**」，周培智的「**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

此一時期從事翻譯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論著者，約有王任光譯卡耳的「**歷史論集**」，華雪（W. H. Walsh）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黃超民譯

---

67 詳見拙作德國史學的東漸（食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六十年五月）。

68 徵信新聞學藝周刊二期（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69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一期（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卷頭語——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

柯林吾 (R. G. Collingwood) 的「**史意**」(The Idea of History)；淦克超譯米賽斯 (Ludwig Von Mises) 的「**理論與歷史**」(Theory and History)；廖中和譯羅斯 (A. L. Rowse) 的「**歷史的功用**」；(The Use of History)；容繼業譯馬隆斯基 (Donald V. Gawronski) 的「**歷史意義與方法**」(History: Meaning and Method)；涂永清譯甘特 (Cantor) 和施奈德 (Schneider) 合著的「**史學導論**」(How to Study History)。

有世界大名的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是此一時期國人所最注目的西方史學家之一。民國四十四年鍾建閎曾將其大著「**歷史之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的節本譯出。[70] 寫專文以介紹其史學理論與方法者，則不可殫數。[71]

此一時期最樂於刊登有關介紹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論著與譯述的刊物，爲食貨月刊及思與言雙月刊。

六、結　　論

1.

西方史學的輸入，有幾種途徑：一爲西方論史學的專書或專文的翻譯，二爲在大學講堂上的講述，三爲通西方史學的中國史家撰寫專書或專文的介紹，四爲西方學者來中國後的傳佈。就西方論史學的專書的翻譯而言，Bernheim, Langlois, Seignobos, Barnes, Collingwood, Carr 諸人之書，皆經國人譯成中文。惟譯文多晦澀難讀，使讀者難以直接獲得西方史學的眞諦，如陳韜所譯 Bernheim 的**史學方法論**，李思純所譯 Langlois 與 Seignobos 合著的**史學原論**，譯文都頗似天書。李思純曾於巴黎大學親受 Seignobos 講授，而譯文竟難讀如此。這是頗爲影響西方史學的輸入的。至於在量的方面，很感覺不够，西方晚近新出的論史學的專書，絕大多數未經譯出，殊爲憾事。

就西方論史學的專文的翻譯而言，前期極少，近三十年來已漸多，散見於各學術性刊物中。如能彙輯爲一編，將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量。

就在大學講堂上的講述而言，這是西方史學輸入中國極重要的一個途徑。從梁啓超、胡適、何炳松在各大學講授起，西方史學在談笑聲中輸入到中國來了。至於民國以來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學開有關介紹西方史學的課，則有文獻難徵之感。

就通西方史學的中國史家撰寫專書或專文的介紹而言，這是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能

[70] 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

[71] 如張致遠先生的史家的靈感——兼論陶恩培的治學經驗（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十一期），陶恩培「歷史研究」的第十二本（新時代第一卷第九期），駱雪倫的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歷史（思與言第二卷第四期），關沁恆的湯恩比的史學方法及觀念（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二十二期），湯恩比與當代思潮（新時代第十五卷第十二期）。

否發榮滋長的關鍵。以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爲經，以中國例子爲緯，疏通證明，西方史學，將易被瞭解；如以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相印證，相切磋，則中西史學有融合的可能。惟此類作品不多見，精密者尤少。

就西方學者來中國後的傳佈而言，誠如西方一位學者所論述，二十世紀初，來中國的歐洲人，其所寫關於中國的作品，在史學方面，最大的缺陷，是其作品並不能將西方歷史寫作的新技術傳到中國來。他們的作品，更近於中國史學，而與西方史學本身，反有距離，尤其是在主題的解釋與選擇上。其原因能容易推想而出，因爲作者住在中國，他們想接受與同時代的中國人同樣的影響，選擇同樣的題目研究。另外的原因是西方史學家信賴他們所研究的國家的學者，有時與中國助手共同工作，即使不是如此，語言的困難，經常使他們憑依中文的近代作品，而不大敢問津廣大的原始資料。結果，他們常常有意無意的接受其觀點與方法，西方歷史寫作的新技術，在他們的作品中，一點表現不出來。[72]

2.

翻譯爲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以印度佛學的輸入中國而言，佛經的翻譯，爲極令人注目的一項。根據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述，自漢末迄唐代開元中葉，譯人一百七十六，所譯經典達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以現存者而論，汰其僞託，刪其重複，亦有五千卷內外。佛學在中國的盛行及其後期的新創，與這一大批翻譯佛經的譯人，有最密切的關係。佛學如此，史學亦然。將與中國傳統極不相同的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而爲國人所接受，要靠大量翻譯西方有關這一方面的著作。晚清以及民國初年，亦即嚴復翻譯**天演論**以後一段期間，中國的翻譯事業，頗爲盛行。晚近又趨沈寂，遊學歐美的學人雖與日增多，然皆醉心於專題研究工作，極少願以全力從事於譯述，以致西方近代大量出現的論史學之作，在中國甚少譯本，甚至不爲國人所知，這是極影響西方史學的輸入的。所以不談輸入西方史學則已，談輸入西方史學，則必須加强翻譯工作。而且於翻譯純粹論史學的著作以外，更重要的應積極翻譯Gibbon, Mommsen, Macaulay, Trevelyan等大史學家的歷史名著，[73]以使國人瞭然於在西方史學傳統下，所寫出來的史著，與**史記**、**通鑑**有何不同。在這方面，目前國內史學界所做的，顯然極爲不够。市面所流行的幾部西洋史譯本，往往不是西方的歷史名著，而是西方的歷史教科書。

3.

中國近代的西化運動，其最初參與的份子，是一些不通西洋語言文字的人，西洋留

[72] 參見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1961, pp. 21-22 Beasley 的論述。

[73] 梅寅生所譯 Gibbon 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oire) 爲節本，不足見其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這是很特殊的一種現象。梁啓超曾於**清代學術概論**云：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曾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嚮昔之西洋留學生，實有負於國家也。」

史學的西化也如此，最先將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不是留學生，而是不能直接閱讀西洋書籍的梁啓超。到民國以後，留學生才比較積極的輸入西方史學了。不過其中極少人專門研究西方史學，以致他們歸國後的介紹，不够深入徹底，影響力大受限制。晚近留學生又多赴歐美研究國史，歸國後始講授西洋史，自然也難將西方史學輸入。言及此，頗增人迷惘！

4.

在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史上，陳寅恪應佔極重要的一席：

「在大陸淪陷之前，我國學西洋史學的留學生，回國來多數是講西洋史，講中國史的殊不多見；即使有之，往往用西洋的格式，填充上中國材料。如果不是削足適履，這種方法自然很好；而多數作品，一望即知其爲仿效。惟有寅恪先生能够眞正貫通中西，他有許多觀點誠然是受了西方影響，如論政治制度和社會習俗等等。他的著作中却一點不露模仿的痕迹，表現的很自然，使人感覺到是在討論中國本有的問題。他從來不像其他的人，由西方書中學來理論系統和問題名詞，在中國書中找材料，七拼八湊生吞活剝的講西方式的中國問題。那些著作，雖然有些地方還看得過去，可總覺得似是而非，彷彿走了樣，如同穿着錯脚鞋，走路有點彆扭。陳先生審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報告書中說：『寅恪生平好爲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同光之際，持論近乎湘鄉南皮。誠知舊酒味酸，姑注於新瓶之底，以待一嘗可乎？』眞的，他作到了用新瓶裝舊酒來，又會裝進新瓶去。旁人來買新瓶，多數只能裝新酒，想裝舊酒，往往不是沒釀好，就是裝錯了醋。」[74]

留學西洋，會通其史學理論與方法，歸而不露痕跡的研究國史，撰寫國史，這是輸入西方史學的最高境界，因爲它已不是移植，而是加以融會貫通了。

本文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4] 牟潤孫「敬悼陳寅恪先生」，見**懺廬寅恪，傳記文學叢書之四五**。